

第六章 結論

後冷戰時期，中共面對蘇聯瓦解不僅改變了安全概念，也認知到國際格局屬於「一超多強」的性質，但仍以推動「多極化」格局作為全球戰略的任務。另外，就安全概念而言，中共瞭解到國際與區域間是相互依賴的，「共同安全」是冷戰後國家相處的最佳特色。且安全問題也不在侷限於軍事面向，反而擴展到經濟、金融等層面，國家間需藉由彼此的合作與互動，才得以解決問題的本質。

中共面對安全觀與國際格局的轉變，不僅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為戰略基礎，進而提出新安全觀作為因應冷戰後局勢的變化。新安全觀的核心原則在表達「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概念，以此作為與大國建立友好關係、順應一超多強格局、加入國際組織等對外戰略的基本原則。同時，以此概念向他國表示，中共無意成為霸權的決心，希望可降低中國崛起所引來他國的憂慮。

在地緣戰略中，中共因為身處亞洲的心臟地帶，且國家邊境與各個國家相互接連。冷戰後需除面臨週邊國家存在的地區衝突外，還面對區域內經濟、領土主權與軍備的鬥爭。其中又以鄰國間的對抗是中共地緣戰略衝突的核心。首先，北京需面對來自亞洲區域內的強國日本、俄羅斯的競爭，尤以中日間的衝突為最，雙方不僅在歷史、對台事務與 TMD 等問題都有激烈的競爭關係；再者，中共也擔憂北韓發展核武危機將不符合中共尋求週邊環境穩定的期望；第三，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干預已違反中共所推行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因此，在中共週邊環境牽一髮則動全身的情勢下，中共勢必提出和平的地緣戰略。

中共在地緣戰略上主要的目標分別是：在安全上確保國家統一與領土不受侵犯；在經濟上確保穩定；在原物料供應及交通安全；在政治上有利於發展國際地位。由此可看出中共國家主要利益仍以發展經濟為主，其次，則是自身實力發展，且力求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上升。

中共在地緣戰略上皆宣稱以「和平方式」解決任何國家間的衝突，藉由推動亞洲地區多極化、區域經濟合作等策略，以緩和週邊情勢的不穩定。但最重要的

實踐戰略則是「全方位的夥伴關係」，此內涵在於與各國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並藉由夥伴關係的建設，遏制美國霸權的擴張。戰略夥伴關係會隨著歷史、地緣戰略與重要性而區分在不同階層，這其中又以中俄、中美的戰略夥伴關係最為重要。

中美兩國關係的複雜關係自 1972 年尼克森訪美即已開啟。歷經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美國對中制裁，與中共的反制裁，到後來柯林頓時期的對中「全面交往」戰略，及目前小布希時期將中共視為「潛在的戰略對手」。雙方從低盪到友好，再到低盪，起伏過程隨著領導人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中共面對美國態度的調整，皆以「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十六字方針作為因應，且更在 1998 年與美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希望藉由上述原則的宣示，以期與美國減緩衝突。

然而，中共想要以此「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原則，來減少兩國之間的衝突，但卻無法奏效，其主因在於，雙方在意識型態、文化、價值觀念上存在明顯的對立。加上，中美更在美日安保條約、「中國威脅論」等事件的意見相左，更加深彼此間的不信任。雖然如此，斷雙方在國際、區域安全問題上有緊密合作的必要，尤其在解決北韓、台灣、西藏等問題上，雙方皆須以頻繁的交流，使得各自的利益獲得提升。

由上得知，中美雙方雖有合作以獲得彼此利益，但彼此戰略矛盾卻不會消除，由美國主導的單極格局，無法忍受任何一國對其挑戰。相反地，中共反對霸權主義，主張應建立多極化的國際新秩序。此差異顯現出雙方在國際戰略已有矛盾，更意味著中美雙方在尋求共同利益時，仍存在重大的分歧。因此，雙方在未來的關係仍是合作中存在鬥爭，在鬥爭中找尋合作。

2001 年 9 月 11 日震驚全球恐怖主義事件使世界局勢從穩定的靜態轉變為不安的動態，出現了「穩而不定」的特徵。威脅的來源不再僅限於國家行為者，也包括其他恐怖組織，美國為了打擊恐怖主義，進而組織反恐怖聯盟，使得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態勢有所調整。再者，反恐合作使大國關係有所調整，大國間以減

少對抗、合作發展為主軸，但由美國領軍的反恐聯盟可看出，美國單邊主義的盛行，將使得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有可能被邊緣化。

911 事件後美國需要尋求中共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投票上的合作，加上中共對中亞地區具有影響力，可提供美國相關恐怖主義的情報交流。因此，小布希將中共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的角色有所更動，轉而以共同建立坦承、建設、合作關係為主。甚至推動「建設合作關係」的落實，高層互訪、軍事交流等。但其主要矛盾仍未解決，由美國發佈的 QDR、NPR、中國軍力報告中，不難發現，美國始終視中共為「潛在的威脅者」，縱使美國威脅來源已不再強調「中國威脅論」，但美國仍擔心逐漸崛起的中共有足夠的能力可挑戰美國霸權。故與中共交往過程，仍將實現其一貫的「交往與遏制」兩手戰略。

就中共而言，911 後的格局仍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且格局的特色是「總體和平、總體穩定、局部戰爭、局部緊張、局部動盪」，中共仍以推動「新安全觀、多極化」為主要的戰略。因此，911 事件雖沒有立即、深層的改變國際格局，但形勢上確有所變化。

首先影響的是中美合作面向的擴展，且國際矛盾也重新排序，促使中共被美國當成主要競爭對手的不利情況得到緩解。因反恐趨勢使然，美國單邊主義色彩將更為突出，短時間內，美國為了尋求大國的合作，將在許多議題上做出些許讓步，但就長期而言，美國藉由推動國際反恐行動，鞏固自己在世界的領導地位，甚至可能藉此機會削弱中共辛勤建立的多邊組織與各戰略夥伴關係。

中共面對此一情勢改變，以多邊結盟與再強化各戰略夥伴關係來反制美國的多邊主義與同盟關係。對美國展現出「既鬥爭又合作」的手段，在反恐合作中凸顯「雖然反恐，但也反霸」的立場，試圖在國際秩序中能「有所作為」。在具體作法上採取親善外交，不強出頭，不與美爭鋒，希望在國際事務上可以取得雙方合作的平衡點。

儘管北京與華府在 911 事件後皆有意改善關係，但雙方在 NMD、美國對台軍售等涉及基本國家利益議題又不易獲得妥協，則難以返回柯林頓時期的「戰略

夥伴關係」。縱使小布希已不再強調「戰略競爭對手」的策略，但此一名詞仍烙印在中美關係合作的面向上。

首先，就中美反恐合作而言，北京對反恐的基調為「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行動；打擊恐怖份子需有確實的證據為基礎，行動應有明確的目標，不能傷及無辜；應尊重聯合國安理會的作用」，且以新安全觀作為制訂反恐基本原則的出發點。中共在反恐合作中，除了得到美國將「東突」界定為恐怖組織外，藉由聯合國機制以反制美國霸權，同時可拉近與中亞地區的外交關係。而中美雙方在金融、港口安全、情報交流、高層互訪、軍事交流等合作面向上有實質的成果與進展。

但由於雙方對恐怖主義界定、反恐打擊的範圍等認知與意圖不同，加上，中共害怕美國藉由反恐在中亞部署軍隊，將會形成對中共的軟性圍堵，因此，在雙方不信任因素作祟下，反恐合作在短期內可提供雙方消彌歧見，但長期下，雙方的矛盾仍會浮出檯面。

第二，關於飛彈防禦系統，中共始終認為飛彈防禦系統的部署會損害全球戰略穩定，限制了核子武器擴散的努力；降低中共戰略能力；阻礙中共推進台海統一的進程。且也認為美國推動防禦計畫的目的在於阻撓中國崛起，防衛系統的主要對象是中共。因此，縱使 911 事件之後提供雙方可合作的空間，但此議題的合作仍侷限於口頭上的宣示與承諾，並無具體的行動。雙方在飛彈防禦系統的爭執仍不下於台灣議題，故未來飛彈防禦系統的爭議仍會持續僵持。

第三，北韓核武危機雖可能讓東北亞與中國週邊環境趨於不穩定，但卻也促使中共在談判會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中共致力推動的首輪至第五輪六方談中，雖無具體的共識，但各方都希望將第四輪共同聲明予以實踐。因此，中共致力於六方會談的召開，將使其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與發言權增加，而美國也樂見中共在北韓問題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不僅如此，雙方也以朝鮮半島無核化作為彼此間最大的共識，因此美中在處理北韓危機時，彼此都繞過爭端，尋求共同維護東北亞的安全。

第四，911 事件後，中美雙方唯一沒有讓步的空間是一台灣問題。台灣問題

涉及中美雙方各自的利益。從美國觀點來看，台灣不僅是歷史上的盟友，在戰略地理位置而言，也有助於美國遏制中共的戰略部署，故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始終採用「戰略模糊」的說法，以使其外交運用更具靈活性。兩岸維持現狀與和平解決是美國的主要利益，美國也堅守不支持台灣獨立，甚至反對台灣獨立的原則，以緩和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嚴重衝突。另一方面，美國也不斷出售武器給台灣，以提供足夠的武器使台灣能夠防衛外來威脅。此作為不僅可防範大陸對台的武力攻擊外，也可達到美國圍堵中共之效。

對中共來說，仍堅持「一國兩制，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但在長期上卻也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提供台灣人民在經貿、旅遊、學術等交流上許多優惠方案；另一方面，仍在大陸沿海部署飛彈，以避免台獨勢力的興起達到無法控制之地步。此外，中共也要求美國恪守中美建交三公報，且停止對台軍售。對中共來說，美國軍售台灣不僅讓台灣當局錯誤認知為美國的盟邦，也促使台灣獨立份子更為猖獗。因此軍售問題仍是中美雙方競逐激烈的議題之一。

但中美在兩岸政策上，並非到達無法緩解的地步，尤其在 911 事件後，美國不僅在布溫會中間接表明反對台獨，雙方也希望可以平行共同管理台灣問題，以使雙方間的歧異降至最低。同樣地，中共一方面也希望增強「經美制台」的策略，以達到遏阻台獨，另一方面，也提出《反國家分裂法》，藉由該法反制台獨，且提高中共軍事嚇阻的可信度，進而達到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目標。

總的來說 911 事件後，美中兩國的確在安全議題中有所讓步，但讓步的過程中，又因不信任因素作祟，所以妥協的空間有限。在此發展下，中美關係未來仍可能處於「既鬥爭又合作」的狀態下，只要對雙方有利的合作事務，且又不干預內部事務的情況下，雙方合作層面會高於鬥爭層面；但若雙方所爭議的議題是核心國家利益者，則彼此的衝突將會高於合作。故中美若要維持穩定關係，可透過「第二軌道」增進彼此的互動與對話，同時，改善雙方交流機制，以協商為主要目標，藉由具體行動消除誤解與猜忌，並且擴大共同點，縮小歧異面，以期共同建立新的國際新秩序。